



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创业回眸

王勇

来源:《日本学刊》2006年增刊

投稿人:

发布时间: 2007-9-4

阅读次数: 1244

回顾本所的创业史,光隶属大学就“一波三折”:研究所创办于1989年,当时取名“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”;1998年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,研究所随之更名为“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”;2004年主要成员分批离开浙江大学,重新组建后称“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”。

一、杭州大学时期:艰辛而甜蜜

杭州大学时代属于草创时期,当时在校内被戏称为“三无”机构:无专职编制、无办公经费、无固定场所。我这个主任经常到处借空屋接待来客,诸如邮寄信件、复印资料、购买书籍等,一概自掏腰包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浙江的民营企业、乡镇企业发展神速,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形成巨大冲击。这股风也透过门缝刮进校园,搅得书生们心绪不宁。一方面是吃惯大锅饭的“官方”研究机构经费缩水,度日维艰;另一方面经济、法律、外语等走红学科实力雄厚,却无法在死板的科研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。

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是一位很有有魄力的学习型管理者,他大概参照了在商品经济洪流中异军突起的民营企业模式,允许各学科教师自由组建研究机构(当然要履行一系列手续),但学校不给予编制、经费、场地支持,任其优胜劣汰。

一时间,各种名目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而“日本文化研究中心”属于比较异类的。有人质疑:“日本没有文化,研究它干吗?”有人告诫:“很多研究机构有企业撑腰,你搞的冷门撑不了多久。”风言风语虽多,我当时铭记的是沈善洪校长的一席话:“给你5年时间,如果成绩卓著,脱颖而出,可以考虑给予独立编制。”

5年一晃眼过去了,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连续5年申请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,同时申请到国家教委课题2项、浙江省社科基金课题1项、日本野村财团课题1项,并与日本山口大学合作申请到日本文部省课题2项,累计申请课题11项。此外,举办国际学术会议6次(其中4次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共同举办),出版著作11种(其中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)。鉴于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以来取得突出成绩,1993年6月被浙江省教委指定为省级研究机构。

沈善洪校长没有食言,记得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党政联席会议上,让我去汇报、陈述,当场拍板升级为具有独立编制的研究所,定编3人,从新建的“邵逸夫科技馆”中拨出约50平米作为办公场地。研究中心自此摘掉“三无”帽子,更名为“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”,而且有了专职编制和固定场所,但学校依然不拨办公经费,所以还是个“国有民办”机构,此后5年,研究所步入快速发展时期。有关中日书籍交流的国际会议、合作研究,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。尤其是代表研究所最新成果的《日本文化研究丛书》(杭州大学出版社)、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)、《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》(日本大修馆书店)陆续推出,在日本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个制高点。

这一时期,研究所的“专门史(文化史)”硕士点门庭兴旺,报考者来自全国各地;同时还与外国语学院合作申报了“日本语言文学”硕士点,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后备研究力量。1997年杭州大学科研处对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进行首次综合评估,在数十个研究机构中,日本文化研究所脱颖而出,获得唯一的一个满分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杭州大学时期创业异常艰辛,但留下甜蜜的回忆。艰辛,是因为从“三无”到“一无”,日常办公、设备添置、外事活动诸经费,均从个人课题费中抠出来,现在放在浙江大学的几个书架,就是王宝平教授从家里搬来捐赠的。甜蜜,是因为有领导的人文关怀,有杭州大学重视文科的传统,记得某年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池田温先生从宾馆乘公交车来访,我在破旧的外语楼面对厕所的小屋里接待他,陋室清谈,其乐无穷。沈善洪校长知道此事后,专门过问,还聘请他为客座教授。

在艰辛中品出甜蜜,这就是杭州大学的魅力。

二、浙江大学时期:全体出走记

岁月如流，转眼到了1998年9月，中国高校史上惊天动地的改革，在杭州付诸实施了。杭州大学、浙江医科大学、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浙江大学，对此举措舆论褒贬不一，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历史来定论了。

经过杭州大学黄金十年磨练、扩展，此时日本文化研究所兵强马壮，专职人员达6名（含办公人员1名），其中教授3名，副教授1名，讲师1名；加上10余名硕士生，数名博士生，形成一支齐整、强大、团结的科研梯队。

“四校合并”后，浙江大学跃升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，我们在这个大舞台上有所作为，制定了详细的5年发展规划，主要内容是加强国际交流、力争与世界接轨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：在浙江大学的大部分时期，全所5名教师均为留学归国学人，“海龟”们利用在国外学术界的丰富资源，引进国际合作项目、招收国外研究生、输送所有博士生和部分硕士生出国留学、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。可以说，留学归国学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属于强势群体，但在浙江大学复杂的人事纷争中便属于弱势群体了。

浙江大学原来是一所理工科大学，“四校合并”之初，按照工科模式实行“系所一体”，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来直属校科技处，于是没有了着落。大约有半年多时间，一会儿传闻把我们并入外国语学院，一会儿又听说将我们落户于人文学院，更多的消息说日本文化研究所将取消，教师分流到各系。在揣揣不安中度日如年，最终还是流着杭州大学血脉的人文学院收编了我们。“四校合并”后的最初遭遇，把我们美好的愿景打消了一半。

稍事安定之后，浙江大学高举“争创世界一流”旗号，鼓励开展国际交流，我们以为时机已到，重整旗鼓，与我们促成的日本4所姐妹大学频频沟通，希望对学校“争创世界一流”多做贡献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浙江大学讲究“门当户对”，嫌那4所大学规格不高，单方面终止了校际交流，甚至没有一封礼节性的公函。我们担忧起杭州大学时期聘请的客座教授的命运，经在学校网站检索，全体神秘失踪，日本方面的客座教授仅乘原浙江大学聘请的几位。

建立一所国外姐妹学校并使之正常运转，往往需要5年、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，而撕毁一纸协议也许只在某些当家人的一念之转；从国外聘请一名真才实学的客座教授，经过多方栓选、层层审核，而删除这些名单恐怕只需操作员键盘一按。我们在杭州大学黄金十年期间构建的国际交流网络，就这样摊垮了。

由于“四校合并”，有得有失，有喜有悲，人际关系异常复杂。“海龟”人士根基既浅，又不暗关系网机巧，可谓处处碰壁，连年申请国际会议、著作出版、重点机构资助，竟无一次获准，让人觉得备受冷遇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浙江大学虽然财大气粗，但每年拨给研究所的办公经费平均不到1000元，连支付电话费还不够；浙江大学虽然想“争创世界一流”，但它的国际化是个误区，5年中我们在国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约70篇（包括东京大学的研究纪要），学校竟然一概不作科研业绩计算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浙江大学的艰苦岁月中，我们虽然被彻底边缘化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全所上下同甘共苦，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小环境，如1994年开设的每周一次读书会坚持不懈，楞是把持续10年之久的《中国正史日本传新注》（3册，约80万字）杀青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浙江大学时期虽然心情不畅，但个人的科研成果却大多最为丰盛。这是得益于杭州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？还是应该感谢浙江大学时代的巨大压力？

“塞翁失马，因祸得福”，这就是我们在浙江大学的遭遇。

三、浙江工商大学时期：任重而道远

2003年前后，浙江大学人事制度出现变化，人称“吐故纳新”工程。只要本人提出辞职申请，无论你是助教还是教授，人事部门现场办公，立等可取。原杭州大学教师大批出走（秉承杭州大学衣钵的人文学院，目前减员约三分之一），日本文化研究所教师也乘势各寻生路：3名到国外，2名转他校。

创办15年的研究所，似乎一夜之间散伙了。然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我们与浙江工商大学胡祖光校长邂逅，我们吐露报国无门、理想难成的苦衷，他当即表示：你们有多大的能力，我就提供多大的舞台。

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交谈，胡校长对学者的体恤、对文科的理解、对国际交流的鼓励，让我们从浙江大学的孤独无援中找回杭州大学时代的甜蜜感受，激起我们第二次创业的激情。王勇教授、王宝平教授毅然辞去国外大学教职回国，一批志同道合者重新聚集起来。

浙江工商大学为了接纳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整体迁入，并考虑今后发展的空间，于2004年7月新设“日本语言文化学院”，日本文化研究所作为校级研究机构隶属于学院。如此，日本文化研究所绝处逢生，短短2年时间里，犹如凤凰涅槃，迎来第二个迅猛发展高潮。

我所现有专职编制9名（含1名日本籍专职副教授），分属古代日本文化研究室、近代日本文化研究室、日本动漫文化研究室，其中教授2名、副教授3名、讲师3名、助教1名，另有专职图书管理员1名、研究助手2名、与学院共用专职办公人员3名。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活动是每周一次的读书会，目前的专题为“中国文献中的日本史料”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
隋唐时代：王勇教授、吴玲副教授、水口干记副教授
宋元时代：江静副教授、郭万平博士、李美子博士
明清时代：王宝平教授、陈小法讲师、孔颖讲师

研究所设有“日本语言文学”硕士点，共分以下四个研究方向：日本语言（导师：聂中华副教授）、日本文学（导师：王宝平教授）、日本历史（导师：水口干记副教授）、日本文化（导师：王勇教授）。硕士点从2006年接受报考，

每个方向招生2-3名。

研究所藏书丰富，总数约5万册，内设多个文库，如早稻田大学文库（28000余册）、国文学研究资料文库（5000余册）、尾崎康文库（3000余册）等，各具特色，而尤以日本历史文化类原版图书比较齐全。

日本文化研究所从1998年5月开设专业网站，“四校合并”后脱离浙江大学校园网，取名“日本文化研究网”（<http://www.zdrbs.com>）；2004年转入浙江工商大学后，将日文版独立出来，创建了面向国际的“Japanology of China”（<http://www.japanology.cn>）。我们在网站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目前可以全文阅览的著作、论文、随笔、史料约15000种，“日本汉文史料全文检索库”收录各种文献约300万字，拥有注册会员近4000人，是国内同类网站中资源最丰富者之一。

研究所目前主编的大型丛书有3套：即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文化研究文库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、王勇主编的《日本文化丛书》（杭州出版社）、王宝平主编的《晚清中国人的日本游记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。此外，出版定期刊物2种：《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》（中华书局）、《日本思想文化研究》（日本国际文化工房）。

我所与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联合主办的“日本思想文化研究”优秀论文评奖活动，面向世界华语地区每年举办一次，至今已经成功举办的7届（详情参照<http://www.zdrbs.com>），竭诚欢迎各地学者积极参与。

回眸历史，瞻望未来，我所将坚持“立足本地，放眼国际”的办所宗旨，坚持“日本历史文化研究”的特色，坚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方针，与国内外同行携手共进，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学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绝处逢生，任重道远，这就是我们在浙江工商大学的感受。

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
所长 王勇
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98号
电话：0571-88086091（兼传真）
E-mail: japanology_ch@msn.com
网址: <http://www.zdrbs.com>